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特產

YAO JIANG TE CHAN

浙江古籍出版社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教育

YAO JIANG JIAO YU

王标 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江碑碣 / 叶树望编著.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715-748-9

I. ①姚… II. ①叶… III. ①碑刻—介绍—余姚市
IV. ①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177 号

姚江碑碣

叶树望 编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玲
封面题字 朱艳萍
封面国画 陆一飞
封面设计 计文渊
激光照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0001—2100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748-9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一）

余秋雨

如果借用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么不妨说，中华文化经络的主干，由大河组成。姚江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但是这个问题关涉到广远的背景，请允许我在这篇序里稍稍讲开一点。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化。从地理意义上，北部的草原、西部的高山都是中华文化的屏障和边极，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东部和南部的大海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存在，一直没有建立亲和关系。因此，中华文化的中心不是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以河川为命脉的农耕文化。河川灌溉了农业文明，又会不断地破坏农业文明，所以治水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使命，“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作为一种“原型”永久承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做治水的大文章。

中国有四条大江，北端的黑龙江、南端的珠江，遥相呼应，拢括了绝大部分国土；而中间部位则是两大世界级的河川：黄河和长江。其中，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中国的早期文明分布很广，但最集中的是黄河流域。不仅远古时代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建都在现今山西、河南的黄河边上，而且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咸阳、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商丘等都城，也都紧贴着黄河。

河川哺育了经济和政治，必然也会进而哺育文化。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大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山西，因此他们所奠定的中国思想的经典模式，也可以说是黄河岸边的思考成果。当然，大智者产生于环境又超越环境，黄河岸边的思考的影响遍及九州大地，与此相应，黄河流域的艺术文化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即便是今天的旅游者也能从一座座雄伟

的古代建筑和一处处雕塑、绘画、石窟中领略当年黄河文明的气势。

但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终于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移了。转移的直接原因开始与文化无关，但后来却显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原因。

转移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河的自然灾害，黄河流经北方的黄土高原，每年要挟带十六亿吨黄沙泥土下来，致使下游淤塞决堤，在近两千年中，决堤泛滥已达一千五百多次，平均每四年有三次。这种频繁的灾害使黄河流域越来越难成为人民生养安息之地，更不可能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了。

转移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邦国密集、政局更迭，使黄河流域成了征战的热土。每次战乱必然会带来大量民众、士人的南逃，南方本来还属荒蛮之地，却因南逃人群的开发而日益繁荣起来。尤其是公元四世纪初期的“永嘉之乱”，大量北方士庶避难南逃，直到很多年之后诗人李白仍然经常目睹南逃景象，而一见这种景象就联想起永嘉年间，他有诗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转移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逃奔的目的地长江流域平安富饶，足可安居。长江也有洪灾，但近两千年间决堤泛滥约两百多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只占黄河水灾的百分之十四，再加上长江流域气候温润，雨水调和，土地肥沃，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很充分的条件。

因此一般说来，晋代以前，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很多；由晋至唐，两河对峙；而宋以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次文明重心的转移常常伴随着严重的对抗，但奇怪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抗，两河文明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这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一次致命的内部冲突，奇迹般地延续了生命。造成这种良好结果的原因是：

第一，长江文明早有悠远的准备和积累，底蕴深厚，高度发育，因此黄河文明在向长江文明转移的时候，并没有在文明浓度上减弱。源远流长的长江在黄河文化显赫之时，早就默默地濡养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仅拥有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而且还拥有不同凡响的屈原和其他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这使得纷纷南逃的士庶百姓不是走向荒昧，而是加入了一种新的文明。

第二，当长江文明悄然崛起的时候，黄河文明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儒家精神

以其固有的宽厚和大气与长江文明建立了友好关系，重心转移变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在风格上，黄河文明雄浑、豪迈、粗犷；长江文明瑰丽、清朗、精雅，都与两河的自然风貌有关，又足以互相补益。当然，这除了两河的阔大气象外，还与两河文明同属农耕文明有关。

第三，一些以长江为生命的文学巨匠，以自己的万里行迹、开阔胸怀和精美作品，把长江文明推上了举世瞻仰的高峰地位，使文化即便不仗经济之势也能巍然自立于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有继屈原之后漫游于长江之畔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他们流连江滨，沉醉长江、描写长江，使长江成了一条文化上的大川，足以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四，与我们这部《姚江文化丛书》有关，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经不亚于滔滔黄河了。

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姚江文化在明清两代的突然辉煌不能不让全国学人回过头去追溯地域性的历史原因。这种追溯为长江文明的履历增加了证据，特别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现，更让人们把深长的思绪投向远古。也许，前面所说的重心转移其实只是皮相之见，把政治的集中、记述的丰富、表层的热闹当作了判定文化重心的标准？也许，重心这一概念的设定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中华文化其实一直处于多重心、也即多穴位的状态？但是，在尚未获得更多切切实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前，我还无法放弃上述的宏观经络图谱。姚江文化，既是这一图谱的产物，又有可能改动这个图谱，这样的研究，太有诱惑力了。

历史终于推进到现代，姚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余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愈加产生了重新认识和发扬姚江文化的责任感。眼前这套《姚江文化丛书》，是在余姚市政府的主持下各相关单位合力编写的成果。格局完整、资料齐备，充分体现了当代余姚人对姚江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历代余姚人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广受瞩目，这套丛书又提供了一个当代例证。

总序（二）

王永康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早已闻名遐迩。自2004年组织上调我来姚工作之后，通过对城乡各地的调查、名胜古迹的探访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增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情。

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风光旖旎的山水城市。放眼余姚，南屏巍巍四明山，北枕滔滔杭州湾，百里姚江横贯平原腹地。而作为全境中心的姚城，则是一水中流、四灵环抱、虹桥飞架、双城相拥的风水宝地。从四明幽谷中的道家洞天、唐诗之路，到杭州湾畔的四季绿原、观潮景点，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佳境。如今，更成为一方旅游观光的绝好去处。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姚江流域沃土遍野，宜于农耕与生活。1973年在姚江之滨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人工栽培水稻，捕鱼打猎，构建干栏居舍，形成原始村落。余姚因而被中外考古学家确定其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继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之后，这里又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当代著名学者史树青教授因而认定余姚为虞舜所出的“姚墟古迹”。

这里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余姚自秦时置县两千余年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汉之交的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等，皆名垂千秋。明清两代，这里更因孕育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梨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之瑜（舜水）而蜚声海内外，以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赞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

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这里众志成城，英勇抗战，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余姚人民爱国爱乡，历来有与入侵外敌、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传统。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姚北群众在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率领下奋起抵抗，终于荡平了倭寇。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辟了以姚南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包括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个地区，十四个县域的人民政权，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余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这里区位优势，经济繁荣，是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中心，东接宁波市区，西临绍兴、杭州，物华天宝，经济发达。沪杭甬铁路、杭甬高速公路和杭甬运河横贯境内，空运、海运近在咫尺，交通十分便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余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齐头并进，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综合实力连年排在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而今，余姚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

在沧海桑田的几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余姚人民在农业、水利、工商、文艺、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创造了惊人的业绩，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史记载。继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又先后确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和浙东区党委旧址等胜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余姚的光荣和幸运！

为了留存文史资料，记载前贤和今人的创业行迹，使之成为弘扬优秀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余姚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辑出版这套《姚江文化丛书》。作为建设文化强市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相衔接，争取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全书的编印任务，以期姚江千年文脉绵延不竭，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概 论

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文化积累,文字史料浩如烟海。甲骨、青铜、竹简、木牍、帛书、图籍,而石刻不仅数量甚巨,而且独具风采。它们不仅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教育军事、风俗风情、文学艺术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古代书迹、各种字体、不同流派书风,所以价值甚高,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人们的呵护珍重和由衷青睐,堪称“石头的书”。

碑之名始于周代。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块碑,是1996年河南新郑县出土的战国时期韩国故城宗庙遗址的“无字碑”,它下半部分中间有一圆孔,被誉为“中华第一碑”。不过这种早期的碑与汉代以后的碑,概念和功用是不一样的。据《礼记·檀弓》记载:“公家视丰碑,三家视桓楹。”“公家”指天子,“三家”指诸侯。丰碑即大碑,用巨木砍成长方体,中间穿一圆孔。“桓楹”是木柱,也穿孔。天子和诸侯下葬时,将其竖立于墓圻的四角,把捆绑棺槨的绳子穿过圆孔,借助丰碑或桓楹的支撑,把棺材缓缓放入墓穴,然后把丰碑或桓楹拔出,也放进墓穴一起埋葬。帝王宫廷前所立的碑是用来观察日影移动测时间的,相当于后来的“日晷”。帝王祠庙门前也立碑,那是帝王乘车骑马前来祭祀时用来拴牲口的。《礼记·祭文》记载:“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丽”即系。新郑县出土的“中华第一碑”就是拴牲口的柱子。这就是碑最初的功用,使用的场所主要是陵墓和祠庙,后来陵墓上的碑也不再拔下来埋进墓穴,而是保留在旁作为标志。从西汉开始有人利用这种标志把墓主的姓名、籍贯、生卒年等少量文字或书或刻于碑上,碑的材质逐渐由木为石所代替,刻写的内容丰富起来了,碑的功用也逐渐发生变化,成为褒奖勋业、颂扬功德的墓碑和祠庙碑。汉代以后,墓碑和祠庙碑又衍生出功德碑、纪事碑、经典碑等多种,碑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刻碑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盛极于东汉,特别是桓、灵之际。至于魏晋,

朝廷屡申刻碑之禁，然其他形式的刻石仍有发展。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碑以纪。自此以后，碑刻又风行起来，近在京畿，远及边陲，几乎遍及中国。宋代郑樵在《通志·金石略序》中说：“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这就是宋人对早期碑志沿袭发展的评述。

余姚存世最早的碑，当数刻于东汉初期的《三老碑》。至今留存在余姚域内最早的碑，是由南宋名臣李光撰文，镌刻于南宋早期的《舍黄槃裴公真像文并偈碑》。品级最高的碑应为唐虞世南撰并书的《孔子庙堂碑》。尚存余姚境内的当以宋理宗御笔《西天福地碑》最为尊贵。余姚其他的传世之碑，当以明碑为主，兼及元、清和民国，其中不乏精粹之作。余姚存世之碑种类较多，主要有墓祠碑、功德碑、记事碑、文献碑和寺庙碑等。

墓祠碑由墓碑和家庙、宗祠碑组成。墓碑是为死者刻立的碑，有两种：一是立于墓前标设性的碑刻，主要是镌刻墓主的身份和姓名；二是神道碑，内容是家世、生平和主要事迹，一般刻立在墓道两侧。如《皇明敕命暨翁鹄墓表》和原立于临山白虎庄谢钟和墓前的《皇清敕命谢钟和碑》，特别是《皇明敕命暨翁鹄墓表》，上列为敕文；中列为明世宗表彰翁鹄德行的诰文；下列是翁鹄墓表，不但记叙了翁鹄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而且还道明了此类碑“概公行履，与过者览焉”的功用。

家庙、宗祠碑是指立于供奉和祭祀先祖的家庙、宗祠以及由地方官府和民间修建的祭奠忠臣、良将、清官、文化名人专祠中的碑刻。一般所记内容是家庙或祠堂建设、修缮的经过，先祖或忠臣、良将的光辉业绩以及助产情况。如东汉《三老碑》记祖父辈的忌日，则为祠祀而设，并非归属谱系之类。此外，还有清代的《黄忠端公祠堂碑铭》、《黄忠端公祠堂碑记》等，均属此类碑刻。

功德碑是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其内容具有典型性，形式具有个案性，勒石镌刻功德无量，历代官民重视，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例如明代王阳明立于江西崇义县桶冈村茶寮隘的《平茶寮碑》以及平定江西南昌藩王朱宸濠叛军后，刻于庐山开先寺读书台旁崖壁上的《记功碑》，均以翔实的史实记录了明王朝正德年间，两次挽救明室危局，维护国家安定的重大军事历史事件，显示出王阳明出色、丰硕的军事才能和实绩。可见，功德碑的个案性往往比史书记载更为翔实，

更有价值。然古人对功德碑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宋代司马光在《梁溪漫志·卷六》中说：“使其人果大贤耶，则名闻昭显，众所称赞，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虽已巧言丽辞，强加采饰，徒取讥笑，其谁肯信？”隋文帝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他的儿子死了，大臣请为立碑，他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①

记事碑，专为某一事件勒石树碑以记之。如清康熙年间的《重修祖庙增塑配享四像碑记》，记载了黄忠端公祠堂增塑徐石麒、朱天麟、黄宗羲、金泽四位“刚方清介”、“忠怀亮节”、“一脉支天”之士为配享之事。《重修余姚县学记略碑》记录了清嘉庆年间余姚学宫的一次大规模兴修活动。当时官府把兴修工程分散包给四方乡绅、士大夫，由他们分头负责募筹资金，并“分董其事”，经六年努力，终使学宫焕然一新。清乾隆年间的《黄墓渡茶亭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重修洞桥序碑》等，均为修桥铺路、建渡造堰、乡规民约方面的记事碑刻。

记事碑所记之事由于有很强的现场性和亲历性，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清同治三年（1864）的《陡壑贺墅堰碑记》，详细记述了贺墅堰的建造经过：二百多年来，姚邑之西的姚江支流上水利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均已毁弃，支河曲港潮汐不进，一遇干旱田禾立槁，百姓日益贫瘠，于是官府抽调当地职员负责贺墅等堰的修缮工程。工程费用按堰内得益农户的田亩数分摊捐谷筹集。三年后工程竣工，从此灌溉有资，旱涝有备，瘠土之田复为沃壤。碑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余姚民间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并为研究古代浙东运河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碑文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是为文献碑。其内容包括圣旨、诏书、敕令、官府文书、经书和典籍等。如明嘉靖七年（1528）的《皇帝敕谕谢迁碑》和《圣谕内阁辅臣碑》，即为此类碑刻。余姚学宫《儒学续科第题名碑记》，题写了明代弘治壬子（1492）科至嘉靖庚子（1540）科五十年间二百七十九人次（残存）进士和举人的姓名。民国二年（1913）的《通告谕示碑》，就余姚朗霞一带业佃户双方土地租赁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规范，在一定的时空上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封建土地关系业佃双方的纠纷和博弈。此类碑均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① 《唐语林》卷八。

寺庙碑是刻立于庙宇的碑。寺观、庙宇都有碑刻，属于寺庙档案。寺庙越大，寺庙越久碑越多。碑文所记都是关于建寺、修庙的经过和兴废情况以及发起人、集资者等。内容涉及圣贤、神佛、宗教和信仰，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历代一直受到推崇。此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如原立于姜山庙内的南宋《舍黄檗裴公真像文并偈碑》，就佛学理论禅律两宗之说进行了辩驳。再如清光绪十三年（1887）余姚县衙的《告示碑》，是因民间修复风神庙，为禁绝不法之徒冒名募捐而出具的告示。除此以外，余姚现存寺庙碑，多为助田碑或捐助碑之类，已无甚大历史、艺术价值。

碑都立于地上，墓志却是埋于地下墓穴中的石刻或砖刻文献。内容主要是叙墓主谱系、记其生卒、述其行事、标识埋葬地点，表述对墓主的赞颂、哀悼和怀念，以求永远铭记，任凭陵谷变迁而不至磨灭。墓志肇始于东汉初期，据《隶释》载，刻于东汉建初三年（78）的《张宾公妻穿中文》即出土于圻中。1929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106）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系为现今所见最早的墓志。以后历经魏、晋、宋、齐、梁、陈皆不衰。隋唐以后墓志的形制文体遂为定式。

余姚历年出土了众多墓志，以南宋墓志为大宗，其次为明代墓志，其中最早的当数西晋太康八年（287）的《晋故郎中周君墓记》。其形状大小如晋砖，其上模印虽仅仅29字，却标有年代及墓主的籍贯、身份、官阶品级等。最迟的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谢元寿墓志》。唐及唐以前的墓志以砖质为多，体积偏小，志版划有线格。宋代墓志多为石质，竖长方形，一般无盖。明、清墓志也为石质，竖长方形或正方形，十之七八有墓志盖，盖面题镌篆书，标注志主之姓名、身份及官阶品级。墓志底书志文，一般为楷书或行楷。志文前有标题，如无标题，则以“君讳某，字某，别号某”起始。志文后大多用韵文颂赞死者，表示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也有墓志盖、底均镌志文，却无首题或标题者，如清《谢弘道墓志》，由书家陈梓书丹，每字5.5厘米见方，寥寥145字却书满志盖和志底。

概览墓碑与墓志，它们的功用基本一致，但又有四个不同：其一，建立的方式不同。墓碑立于地面墓前或墓侧；墓志却被埋入地下墓圻。其二，形制有所不同。墓碑碑首装饰性很强，工艺也精致，造型有圭、平、圆（半圆），有的还雕成典雅的螭首。碑下承石制碑座，有的雕成华丽的须弥座或力大无穷的

神龟。而墓志就显得非常朴素简洁，体积小于墓碑，呈竖长方形或方形，周边无雕刻纹饰，下无座盘，有的墓志却有盖履合。其三，材料有所不同。墓碑肇始于木，后都用石材制作；墓志虽也为石质，但也有用砖、瓷烧制者。其四，所叙内容大体相近而又各有侧重。墓碑侧重于记叙墓主家世、封赏和主要事迹，有种光宗耀祖的功用；墓志除记述墓碑的内容以外，还侧重记叙志主的履历、寿年、卒葬年月以及子孙概况等内容。

固然墓碑与墓志都是重要的史料，但也不可过信。它们之可贵在于一经刊刻就难于挖改，不同于书籍传抄翻印之难免传讹。然而就其撰述有误这点来说，石刻与史书都是可能的。更何况有著文者往往受人托请，顺情虚饰，遂成风俗。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万年县君志》中讲：“大抵家人贿赂，词客阿谀，真伪百端，波澜一揆。”如明代青词宰相袁炜墓志，由当时武英殿大学士吕本撰文，文中不乏“秉公竭城、清忠亮直、鞠躬尽瘁”之类的褒谀之词，并称明世宗与袁炜为“明良相遇，情投鱼水，可谓千载一时矣”。其实袁炜为人为当时正直之士所不齿，他排斥异己，为迎合奉承皇帝，竟不顾天下安危，一味粉饰太平，以青词谄媚，皇帝自然龙颜大悦，以至获得赏识，不断升迁。唐代著名文人李邕一生写的碑文有七八百篇，他自己认为实话实说的只有一通，言下之意是其余的都有溢美之词，属虚夸不实之言。但事情也不尽如此，如明弘治十六年（1503）的《存耕王处士墓志》，是由余姚王华撰写的，所记王处士生平事迹可信度就很高。当时王华在京做官，有好友受人之托奉王处士《行状》前来求志文。王华与王处士素昧平生，对其《行状》也不甚相信，为求真实，他不厌其烦地约请门生和好友多方了解王处士生前处世为人，然后才慎重地写下志文。因此，墓碑和墓志的价值跟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密切关联，它的真实性可信度仍然不可忽视，决不可低估。

与墓志关系密切的墓茛，又称买地券，是买墓地的契约，刻于石上或砖上，置于墓穴中。《释名·释书契》：“茛，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因此多数墓茛为两石合并者，当然也有整块的。买地券是为死者购买阴地的凭证，刻石为券契，以告地神，使死者在阴曹地府免受野鬼侵犯。内容包括墓地大小、四方界限、茛域走向等，反映了当时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买地券起始于汉代，早期买地券字数不多，文义简单，格式也不一致。发展到唐宋时，文字增多，格式也逐渐公式化。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到当时丧葬风气时说：“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

看得出宋代以来，埋葬立券已成定制。

买地券所述内容有虚、实之分。如余姚所藏的《大宋咸淳三年买地券》，券文书写为正一行，倒一行，称为阴阳文，记述了余姚任益，经村巫相卜，用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钱买下双雁乡的一块地作为寿域，其四至为：东止青龙，西止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并以此告知地府诸神加以保护。券文中的钱款数及四至，即青龙白虎之属，皆虚无缥缈之词，为村巫之沿习陋俗，纯属虚构，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余姚丰山出土的《大明弘治六年买地券》之形状、质地、书写格式、字数及所用文辞，即公式化状况均与前通宋代买地券雷同。由此可以看出，宋咸淳至明弘治二百余年来，买地券的形状及行文习俗并无甚大变化。

买地实券在余姚不见出土。在绍兴富盛跳山发现有一块东汉建初元年（76）的摩崖买地券，称《建初买地刻石》。全文为隶书：“大吉，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迁此冢地，直三万钱。”它为摩崖刻石，与一般作为随葬品的地券不尽相同，具有更加可靠的史料价值，寥寥数字，却记述了有关土地占有者、土地价钱等多方面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一件反映汉代土地买卖情况的实物标本。

古代碑刻和墓志（以下简称碑志），每每皆为古代社会生活之浓缩写照，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处处都可窥见数千年漫漫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沧桑，以及先贤俊杰隐隐散发的旨趣、品性。有鉴于此，碑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司马迁著《史记》时已将石刻文献纳入其史料范围，《秦始皇东纪》中就收录了始皇巡游天下时树碑立石，宣扬功德的刻辞原文。对碑志的真正研究，应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清代。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序言中曰：“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余姚古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数学识通达的黄宗羲为第一人。他写作的《金石要例》虽然仅一卷，引文例三十六则，但却在前辈学者传统著述方法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放到出土与传世的石刻文献方面，着重考察唐代以前的碑铭、墓志，指出只有了解了铭、志的渊源，才能了解古人写墓志、碑铭时的“义”，也不会局限于名人的作品中。因此，他讨论了石刻文体的正例到变例的出现时间及时代特点，从而为清代的石刻义例类研究开辟了新的园地^①。一千多年来，古代学者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不断沿袭发展，

姚江碑碣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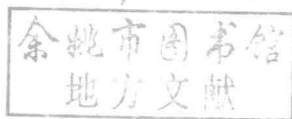
① 参考陈春生：《金石三例与金石义例之学》，《东南文化》2000年7期。

至今已大致可窥碑志之首尾起伏，一脉贯通之绮丽气象。以下从历史、文学、艺术三方面透视碑志之珍贵价值。

首先是历史价值。碑志对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的记载有补充、修正甚至否定正史的参考价值，往往成为历史疑案的重要物证；利用碑志所提供的信息和出自其引文的，常常成为支持一个论点的铁证。余姚出土的东汉《三老碑》涉及古人忌日问题，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认为：古人“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即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即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并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为忌日，非古矣。因《三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俞樾依据《三老碑》考释出古人不同于今人，而是一年为六忌日的习俗。余姚发现的南宋参知政事李光墓志、敷文阁学士汪大猷墓志以及明代宰相袁炜墓志等，不仅详叙志主家世生平，尤其重要的是印证了正史所记，并在官秩次第方面补充修正了正史的许多内容，使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更趋丰满和真实。又如流落余姚的南宋宗室赵善誉墓志和赵汝备墓志，在宋宗室世系及文化贡献方面结合文献考核，补充并纠正了正史记载之误，为研究宋史及南宋赵氏皇室留下了重要记载。再如发现于余姚梅溪及长丰的七通宋代王速家族暨姻亲墓志，特别是其中《王速墓志》洋洋 3760 字铭文，为墓志中宏篇。王氏墓志不但有益于地方志书的完善和研究，而且为王氏作为北宋时期的河北名门望族的综合性研究及宋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素材。

历史价值还更多地体现在历史文献方面，如余姚临山的《皇帝敕谕谢迁碑》、《圣谕内阁辅臣碑》和《皇清敕命谢钟和碑》，以及民国时期余姚县知事的《通告谕示碑》等，均涉及圣谕诏书、经济事务、规章制度、经典古籍，从历史的层面，为后人保留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纸质的书籍要受虫蛀潮霉的侵袭，石刻材质却为历史文献的保存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余姚的大量碑志文献所彰显的历史价值和发挥的作用，确实无愧于史学界所誉之“会说话的石头”和“储存历史记忆的容器”。因此，凡是以史为鉴的人，无不重视碑志的认知功能。

其次是文学价值。碑志上的文章大多由古代学者、文人或仕宦显达撰写的，撰写者地位越高，名气越大，碑志的等级就越高。因此，碑志的文学性及其品质是不言而喻的。除碑志文中的高华诗词本身就是文学之外，其他均属于文学中的散文范畴。碑志文的撰写是一种泛文学化的写作，其中不乏措辞璀璨的美文作品，



通篇皆可作美文来诵读。如唐代余姚先贤虞世南撰并书的《孔子庙堂碑》洋洋两千余言，挥洒自如，文辞雅丽，语义通达，诚然是篇脍炙人口的杰出文学作品。立于余姚姜山的南宋《舍黄檗裴公真像文并偈碑》之碑阴所镌的六首颂赞姜山的七律诗，皆为佛学尊长所作的诗坛精品。其他还有宋代《承奉郎致仕老先生杨公圻记》、《孙自中墓志》、《邢氏确墓志》以及明代王华撰文的《存耕王处士墓志》、谢迁撰的《承德郎刑部主事南坡邵公墓志》等，均为余姚墓志散文的杰出代表。一般在散体文的墓志文后，还颂有韵体四言文，也有三、五、七言韵文，这是撰文者力图远绍《诗经》和《雅》、《颂》，模仿《楚辞》的缘故。这种韵文无论是几言，都属于诗的范畴。碑志文把散文与韵文相结合，却是它最大的文学体裁特点。

第三是艺术价值。从狭义的角度讲，刻写有文字或图案的竖长方体或横长方体石头都可称碑刻，秦代称刻石，看似造型庄严、神圣，千碑一面，其实严谨而不呆板，整饬而有变化。碑首往往刻有仙人、云纹和祥禽瑞兽。等级较高的碑首雕有螭龙纹，二、四、六条螭龙交相盘绕。如余姚传世的《圣谕内阁辅臣碑》，为横碑平首，碑首线刻有两条螭龙相对，中间托起一颗火焰宝珠，称为“二龙戏珠”。均为圆首的《皇帝敕命谢迁碑》和《皇帝敕命谢钟和碑》，碑首采用高浮雕的技法，装饰卷云纹和“二龙戏珠”。《皇帝敕命暨翁鹄墓表》的碑版中皇帝敕命部分采用线刻技法，饰以腾飞的螭龙和卷云图案围绕；翁鹄墓表部分，边饰刻镌飞翔的仙鹤和卷云。碑座有正方体、长方形、须弥座，有的如余姚大隐的《宋汪大猷神道碑》之碑座，被雕成一个巨大的石龟，叫做赑屃，现仅赑屃存世，其神道碑已不可寻觅。这种线刻、浮雕、圆雕和透雕等雕刻技法的综合运用，使碑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再说碑刻简洁、洗练的图案设计，高雅、大方的纹样选择，都极富装饰效果和视觉效应。

碑志上的文字是由几个人共同完成的，除撰文者外，还有书丹者和镌刻者。书丹和镌刻是书刻结合的书法艺术。书丹者一般都是当地书家，中国的书体篆、隶、楷、草、行，其书法之发展变化，在余姚存世碑志上可窥其一斑。碑在西汉时极为罕见，宋代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东汉前期的碑志隶书，由于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如东汉初之《三老碑》，字形扁方，笔画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却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魏晋南北朝由于禁碑，所以碑刻存世甚少，余姚仅出土《晋故郎中周

君墓记》一方，不难看出，此时的碑志书法正处于由隶转楷的阶段。唐代是碑志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书家辈出，他们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特别是对楷书的加工，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大楷书的体系。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长久以来成为学楷书的正规风范。宋元明清以来，碑志书法大致沿袭唐代，无甚大变化，大抵首题为篆书，正文用楷书，楷法精工而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志生动。同时还有行楷，既清纯秀雅，又浑朴恬淡。如书家陈梓书丹的《清谢弘道墓志》，书法圆润清朗，外柔内刚，有面目一新之感觉。此外还有巍然屹立于江西庐山和崇义县的王阳明平宁王《纪功碑》和《平茶寮碑》，一手漂亮的楷书，既端庄又沉稳，高超的书法艺术令人赞叹。所谓“书丹”，就是用毛笔蘸着朱砂把字直接写在碑版上，然后再依形字镌刻。另外一种摹勒上石的方法，就是将碑文写在纸上，再在纸背以银朱依样勾勒字形（称双勾），然后覆于碑版上，以纸数层叠放于摹纸上，以石均匀研磨，使双勾银朱粘于碑版上，收起摹纸，即可刊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留书家墨迹。如《舍黄檗裴公真像文并偈碑》阳面碑文末署有“云黄山僧妙格摹刊”碑阴署有“蒋椿摩刻”以及《宋故武当军节度推官高公墓志》文末也署有“四明陈曦模刊”字样。这些碑志均为古代石工采用了摹勒上石之方法。

碑志文字最终是由石工完成的，也就是镌刻者。因此，石工的文化程度和雕刻技艺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东汉《三老碑》，用笔“如锥画沙”。此现象据清金石家魏稼孙在《绩语堂碑录》中说：“《三老》锥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它碑双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折裂如松皮。”可见刻工刀法不同，书法效果则不一样，甚至会使人感到笔法不同的假相。像余姚存世的宋代墓志上某些楷书方折崭齐的笔画，是刀的效果，不是笔锋所能传达到的。比较著名的石工一般都留名于碑志文末，如“刊石人某某”或“某某刊”。据余姚存世宋代墓志统计，当时余姚一带知名的镌刻工匠有马氏家族的马信、马坚、马谦；陈氏家族的陈曦、陈璋、陈奕，其他还有李显等。足见以碑志书法艺术，供后人鉴赏和学习，刻石者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以来，余姚的古代碑志更是受到重视，迄今文物部门收藏的历代碑志已逾百通。碑志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是多方面的，